

[文章编号] 1003—4684(2021)06-0071-03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鬼神俗信及审美倾向

李 莉, 胡艳芳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20 世纪上半叶,大量涉及鬼魂信仰和神灵崇拜的民风习俗成为小说的审美对象。部分作品表现了这一古老民间信仰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探索鬼神俗信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展示其迷人的丰富性;在现代科学文明和启蒙话语的视阈下,多数作品讲述了一个个“无鬼”“破神”“祛魅”的故事,“鬼”“神”被褪去了神秘外衣和浪漫气息,成为“国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关键词] 鬼魂信仰; 神灵崇拜; 审美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46 [文献标识码] A

鬼神信仰独特的神秘色彩及其对传统社会人生的广泛渗透和影响,使之与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自古代神话、诸子散文、汉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元杂剧、明清小说,到处可见神灵鬼魅的身影。20 世纪上半叶,随着新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广泛关注,大量涉及鬼神信仰的民风习俗走进作家视野,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文化观点和审美趣味的影响,现代作家对鬼神俗信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赋予现代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风貌。

1 现代小说中的鬼神俗信

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在阴间继续活动,甚至以种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并影响人事,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民风习俗。鲁迅的《祝福》、艾芜的《端午节》、台静农的《红灯》等作品涉及年终“祝福”、端午驱鬼、中元祭祀等众多鬼魂俗信。《祝福》以“祝福”为背景展开叙事。“祝福”是一种绍兴岁时习俗。绍兴人俗信,除夕之夜众鬼游荡,人们可放鞭炮避之,不过,若遇死人等不吉之事,便以为会带来晦气与厄运。祥林嫂本是再醮的寡妇,又偏偏死在“祝福”之时,令鲁四老爷十分不快:“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1]。《端午节》描写的是“赶韩林”风俗。传说韩林是鬼王,常出没于端午节,把他赶走,小鬼就不易附身了。由于财主告密,革命者被杀,担心革命者的鬼魂报复,财主于端午节发起了“赶韩林”活动,现世的血泪夹杂在民俗叙事之中,揭示了普通民众对冥界的恐

惧。阴历的七月半为中元节,亦称“阴节”“冥节”,《呼兰河传》(萧红)等作品均有涉及,相关习俗在《红灯》中有较完整的表现。得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困窘,忍饥挨饿,终因无钱买柴铤而走险,被杀头示众。母亲借钱买纸,粘了几件长衫烧给得银,偿还他生前穿上长衫的心愿,又用箔纸叠成金铤、银铤,悄悄送到道士们为鬼魂而设的寒林,然后,糊好红灯放在河中,为亡灵超度。

鬼魂信仰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导致“冥婚”“抱牌成婚”等种种特殊婚俗的产生,也直接制约“再醮”寡妇的命运。20 世纪上半叶,受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格外关注传统鬼信仰对性伦文化的渗透与制约。《菊英的出嫁》(鲁彦)讲述的是浙东“慰灵”的古旧民俗——冥婚。菊英八岁夭折,十年后,菊英娘为“成年”的女儿认真挑选一门亲事,办的嫁妆甚至比一般人家正常嫁女还要好。吴组缃、施蛰存分别以“二姑姑”(《菉竹山房》)和婵阿姨(《春阳》)在未婚夫离世后抱灵牌成婚的人生故事,表现“抱牌成婚”这一特异婚俗。按照传统俗信,“亡夫为寡,其夫之魂魄常随妇身”“寡妇名孤矜,又称鬼婆”^[2],寡妇再嫁,便是双重不节不烈,寡妇及其家人均被视为“不祥”,“倍受社会非议”^[3]。通过祥林嫂、翠姨(萧红《小城三月》)等女性的悲惨命运,现代小说生动演绎传统鬼魂观念及其对社会人生的巨大威力。翠姨秀外慧中,美丽温婉,爱上了在哈尔滨求学的青年才俊,只因是再醮寡妇的女儿,只能由家人婚

[收稿日期] 2021—03—11

[第一作者] 李 莉(1968—),女,湖北荆州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通信作者] 胡艳芳(1994—),女,湖北恩施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配给乡下的陌生男子,纵有千般委屈和不甘,也不敢表露只言片语。

与鬼魂信仰同样普遍的,是神灵崇拜,即相信神灵的存在,相信神对于人世至高无上、不可质疑的权威。传统社会,无论身份、年龄、性别,神灵崇拜是人们共同的信仰,各种乞神、拜神、祭神的活动和仪式也因此充斥于现代小说叙事。陈炜谟的《夜》中,鬼神信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灶神之外,猪圈和茅房也由神灵主管,祷告神灵“颁灵”,是最常见的信仰习俗。同样,鲁迅笔下的吉光屯完全受制于由社老爷、瘟将军和王灵官组成的冥权世界,那盏在庙里燃烧了数千年的灯“就像众神的眼睛”一样注视着吉光屯,并给它带来吉祥,“人们相信那盏灯一旦熄灭,众神就会离去”,灾难也将随之降临^[4]。呼兰小城,人们为排解心中悲苦,求助“神仙”保佑,因此有了唱秧歌、野台子戏、娘娘庙会等精神上的“盛举”。在明达婆婆(王鲁彦《河边》)、老通宝(茅盾《春蚕》)、云普叔(叶紫《丰收》)等生活的宗法制社会,土地庙是遍布四周的庙堂神祇,其次是城隍庙、供人们求子的观音庙、大仙庙和关帝庙。明达婆婆病体奄奄,不愿进城住医院,而是冒着春雨到“灵验”的关帝庙求神。老通宝“素来只崇拜两件事,一是菩萨,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没有菩萨保佑,任凭你怎样刁钻古怪,弄来的钱财到底是不‘作肉’的。”^[5]这里所谓的菩萨就是“财神”,每逢朔日、望日,老通宝便到“财神堂”磕头,几十年如一日。久旱无雨,云普叔们则虔诚地扛着万民伞,抬着“关帝爷爷”乞雨。求雨是民间常见的仪式,在中国北方流行甚广,尤以山西为盛,人们采用各种办法求助于神灵,或以牲畜供献,或以人祷,或抬着神位、神像游乡展示。在沈从文创作的湘西世界中,神、鬼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天旱祈雨、生病求医,还是断案定罪、出兵打仗,无一不祈求神灵的旨意(《风子·神之再现》《神巫之爱》)。《哨兵》等作品甚至仿照鬼故事的惯例,刻画种种恐怖的物象,暗影、罡风和猫叫都被哨兵臆想为鬼怪作祟。

2 审美倾向

鬼神信仰是传统社会人们在精神上赖以寄托的民间信仰之一,鬼神祭祀中暗寓民众的情感和愿望,人们或以此寄托对故人的思念,或传达改变现实的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自《诗经》《离骚》始,鬼魂信仰、神灵崇拜一直深受传统文学的关注,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文学独特的方式参与鬼神信仰的建构,表现了这一民间俗信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关联。现代小说传承了这一文学传统,部分作家作品积极

地探索鬼神俗信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展现民俗叙事独特的神奇色彩。《红灯》《菊英的出嫁》《风子·神之再现》《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亡灵并无狰狞之相,神的面貌亦多庄严静默,以鬼神为标志的民风古俗中闪烁着善与美的灵光。当得银妈终于完成儿子所有的“遗愿”,如愿以偿地将红灯放入河中时,她“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度,穿了大褂,很美丽的,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6]这一凄凉而美丽的想象使她得到莫大的精神慰藉,“痛楚”而又“欢欣”。菊英的母亲痛失幼女,给女儿操办冥婚竟丝毫不逊于任何一庄婚事。从选亲、择日,到对嫁妆和仪仗队的挑选,无一不细致入微,令人不得不在慨叹感人至深的母爱的同时,感悟古朴民俗迷人的丰富性。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通过大量鬼神俗信再现了古朴自然的人情人性 and 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作者截取流传民间的奇闻异事剪辑成篇,描绘传统湘西社会人神相欢、天人合一的奇妙境界。在那些民俗活动中,神鬼虽美丑、善恶不一,却无不赋以人性,神的仪式亦多与人的庆典融为一体,人、鬼、神、大自然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赋予作品绮丽绚烂的浪漫主义色彩。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质疑、批判鬼神信仰的学者。他们认为,人的吉凶祸福由人所生,而非鬼神作祟,“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晚清以降,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掀起了一股破除鬼神迷信的思潮,在大多数现代作家笔下,鬼神俗信褪去了神秘外衣和浪漫气息,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7]相关叙事成为现代小说启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出现了一个个“无鬼”“破神”“祛魅”的故事。小说大多以独特的叙事视角拆穿原始俗信背后的种种把戏。陈姨太为高老太爷请神汉下神,遭到了觉慧的强烈反对(巴金《家》)。吉光屯出现一个被众人认定为“疯子”的叛逆者,随父祭祀众神,却“识破”了古老的骗局,要吹灭那盏灯。《活鬼》(鲁彦)则以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的视角,暴露“拜请丁天师”等民俗活动的真实面目。自从娶了大媳妇,荷生家里时常闹“鬼”。咸亲自称善于捉鬼,被荷生请到家里。荷生睡熟后,咸亲悄悄与荷生嫂同床,且故意弄出些声响,吓唬荷生。得知桐油可以辟邪,荷生便主张点着桐油灯睡觉,并拜请丁天师,咸亲不得已离去,荷生家的鬼也似消失。一天晚上,油尽灯熄,屋顶又有异样的声音响起,荷生看到窗外的黑影,持猎枪打了过去,听到一阵远去的足音,此后,荷生再也找不到咸亲的身影。作品读来似乎是一个闹剧,却于闹鬼、驱鬼之间解构了所谓的“鬼”。

与此同时,鬼神被舍弃了原始色彩,成为“国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春蚕》《丰收》等作品于厚重的地域俗信之中揭示蒙昧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们普遍愚昧、麻木、落后的精神状态。老通宝、云普叔、阿芝婆媳、明达婆婆等人一生谨守神明,却遭受无穷的灾祸,甚至丰收成灾。《祝福》《长明灯》《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则通过祥林嫂、翠姨等人的悲剧人生,揭示鬼神俗信对于正常情人性的扭曲与扼杀,暴露原始思维蒙蔽下的民间信仰的残酷与罪孽。在现世人生中失去了一切的祥林嫂将心灵的慰藉寄托于阴间,那里有她死去的儿子和丈夫。然而,柳妈告诉她:“你将来到阴世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8]。死后的恐怖与诱惑撕裂她的灵魂,最后在鲁镇“祝福”的鞭炮声中悲惨地死去。同样,翠姨在再醮寡妇的女儿的阴影中抑郁而终,只留下一声长叹:“我的命,是不会好的”。现代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的烛照下,传统鬼魂信仰和神灵崇拜在部分现代作家笔下显示出灰暗、恐怖的面影,承载着“吃人”的文化基因,小说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反思色彩。

3 结束语

鬼神信仰是人类原始思维的遗迹,是人类文明的化石,古往今来,也一直是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虽然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型,以“鬼神崇拜”为代表的原始信仰在民间依然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乡土社会,存在一个丰富多彩的“民俗—鬼神”世界,也因此受到文学的青睐,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气息,丰富了文学的审美风貌。受现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的影响,现代小说中的鬼神叙事更多地被纳入启蒙话语,成为文化反思和“重塑”国民品德的重要路径。

[参 考 文 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327,334.

[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373.

[3] 周建人.绍兴的结婚风俗[J].新青年,1920(7):126.

[4] 鲁迅.鲁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15.

[5] 茅盾.茅盾小说集[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47.

[6] 台静农.建塔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8.

[7] 肖向明.民俗·启蒙·审美——民间信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取向[J].云南社会科学,2008(1):147-152.

[8] 鲁迅.鲁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334.

Ghost and God Belief in the Chinese Modern Novel and the Aesthetic Inclination

LI Li, HU Yan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remendous folk customs which were related to ghost belief and god worship became the aesthetic objects of novels. Some works manifested the links between this ancient folk belief and people's daily life, and explored their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human life, showing their attractive richness; most modern writers described stori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ghosts or g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ir writings. Therefore, ghosts and gods have lost their basic and original meanings, becoming synonymous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r national ill behaviors, have been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like never before.

Keywords: folk custom; ghosts and gods; folk belief

[责任编辑: 张岩芳]